

张燧《千百年眼》因袭杨慎《升庵集》考论

朱志先

摘要: 张燧《千百年眼》12卷是晚明一部通史性史论著作,以其犀利的见解为当世及后人称道。但书中却有很多因袭杨慎《升庵集》之处,具体表现为完全抄录而未名出处、部分截割而未加标注、简单增删与割裂拼凑、取其文而乱其意。本文着意从史源学的角度予以考察,对张燧因袭杨慎之文予以整理,进而分析其因袭杨慎之文的原因。

关键词: 张燧;《千百年眼》;杨慎;《升庵集》

中图分类号: G256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9-1017(2011)01-0017-07

张燧,字和仲,湖南湘潭人,明代万历举人,著有《易筏》、《未见编》、《经世挈要》、《千百年眼》等。其中《千百年眼》在当时比较流行,“王夫之谓:‘当时词人,特此为稗贩之具’;其后阮元亦称其书”^①,清人孙点称“其抒写心得,独具只眼处,足令阅者惊其新颖,得未曾有。然核其事实,按之情理,并无一毫偏倚于其间,洵杰作也。”^②《千百年眼》被点校出版时,被誉为“力破俗儒拘儒剿袭古人牙慧的陈言,推出为迂腐文人不能道、不敢道的新见”^③。目前学界亦认为张燧“勇于标新立异”^④,其书是“晚明史学的杰作”^⑤和“学术的真金”^⑥。笔者认为《千百年眼》作为一部通史性的史论著作,其标题醒目,观点新颖,确有可取之处,但亦有许多不妥。诸如全书512个条目中有80余条是引自杨慎

之书,其中73条是完全没有任何注明^⑦,与其所反对“影响剿袭,满纸炫然”和“谬以是意提衡其间”的见解是不相符合的^⑧。

既然《千百年眼》在明清乃至当代都是颇受欢迎的史论著作,笔者希望从史源学的角度来梳理《千百年眼》中因袭杨慎之处^⑨,以便学界更好地了解《千百年眼》的学术价值及其精辟的史论。

一、完全抄录而未名出处

张燧《千百年眼》中每个条目都有一个标题,概括其对问题的看法,但其中有26个条目是完全抄录杨慎的而未加任何注明。其例如下:

1、卷1“四岳为一” (2页),见杨慎《升庵集》卷42“四岳为一”^⑩。

2、卷1“纳于大麓非山麓” (4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42“纳于大麓” (290页)。

3、卷2“不日成之” (21-22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42“不日成之” (304页)。

4、卷2“废井田自管仲” (22页),见《升庵集》

①《湘潭县志·张嘉言传》,参见续修四库本712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643页。

②孙点《千百年眼·跋》,参见钱茂伟著《明代史学编年考》,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0年,第299页。

③张燧著、贺新天点校:《千百年眼·出版说明》,河北人民出版社,1987年,第1页。(注:文中所引张燧《千百年眼》中的内容皆出此本,故仅标明卷数和页码)

④鄢烈山《张燧的异端说》,《群言》1991年第9期。

⑤钱茂伟《张燧〈千百年眼〉:晚明史学的杰作》,《学术月刊》2001年第5期。

⑥王子今《千百年眼》,《博览群书》2002年第7期。

收稿日期:2010-04-22

基金项目: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之阶段性成果。项目编号:[2010]153。

作者简介:朱志先(1976—),河南南阳人,咸宁学院人文学院讲师,历史学博士,从事文化史与史学史研究。

⑦王重民先生认为“(张)燧著书颇学杨升庵,特学力未及,然亦时有新解。”王重民: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年,第337页。

⑧张燧《千百年眼·小引》,河北人民出版社,1987年,第1页。

⑨张燧因袭杨慎之文,应该绝大部分源于《升庵集》,从刊刻时间来说,《千百年眼》刊于万历四十二年,即1614年,据李贽在《焚书》卷五“读史·升庵集”中所论可知李贽读过杨慎的《升庵集》,而据《焚书·自序》可知《焚书》成于1591年以前,那么杨慎《升庵集》肯定在此之前已经刊于世。

⑩杨慎《升庵集》,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270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290-291页。(注:文中所引杨慎《升庵集》内容皆源于此册,故仅标明卷数和页码)

卷78“坏井田”(779页)。

5、卷2“秦霸不由孟明”条(24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51“孟明”(430页)。

6、卷4“黔首之称不自秦始”(59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44“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(礼祭统)黔首共饮食莫之知也(内经)”(322页)。

7、卷6“方望贤于范增”(94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49“方望贤于范增”(407页)。

8、卷6“陈蕃悬榻”(98-99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68“悬榻”(667页)。

9、卷6“景毅耻不与党锢”(99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49“景毅”(404页)。

10、卷6“清淡始于汉末”(99-100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70“仲光统郑泉”(691页)。

11、卷6“汉末史传屈笔”(100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47“汉末史传屈笔”(370页)。但遗憾的是杨慎此条确实节选自刘知几《史通》卷7“内篇·品藻第二十三”。

12、卷6“取刘璋不系孔明”(103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47“蜀取刘璋”(378-379页)。

13、卷6“《出师表》缺句”(105-106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47“《出师表》缺句”(377页)。

14、卷6“晋史矛盾”(109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47“晋惠帝”(382页),另外,《升庵集》卷72“蛙鸣”(705页)皆指出“《中州记》载惠帝闻蛙鸣问之侍臣,贾徽对曰:在官为官蛙,在私为私蛙。帝曰:若是官蛙可给廩比。《北史》所载为详,蛙给廩已自异矣。文中子作《元经》,又曰:帝问蛙鸣,尤可笑也。然《元经》非出文中子,盖阮逸贗作耳”,而张燧不载此,似乎不妥。

15、卷7“太宗纵囚有所仿”(122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52“纵囚论”(457页)。

16、卷7“徐有功难于皋陶”(124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51“张文成赞徐有功”(437页)。

17、卷7“《滕王阁记》出处”(125-126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53“紫电清霜”(469页)。

18、卷7“卢怀慎先见”(127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51“伴食”(438页)。

19、卷8“房琯长策”(133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51“房琯”(431-432页)。

20、卷9“晋、唐不通字学”(152-153页)开篇第一段完全摘自杨慎《升庵集》卷63“笔法字学”(606页),第二段则注明引自杨慎《六书索隐序》,并且文末指出“按此段引驳甚精,足为字学开一堂奥。”可见张燧对杨慎之佩服,而杨慎此论见于《升庵集》卷2“《六书索隐序》”(18-19页),说明张燧确实读过杨慎此书。

21、卷9“《五代史》不公”(159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47“钱鏐”(379页)。

22、卷10“介甫寡助”(167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51“王安石”(438-439页)。

23、卷11“中兴战功不纪武穆”(184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48“中兴战功不纪武穆”(402-403页)。

24、卷11“宋人损益经文”(185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65“瓊语”。

25、卷11“帝在房州之谬”(186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43“天王居于狄泉”(315页)。

26、卷12“翰林不肯撰元宵致词”(210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68“翰林撰致语”(665页)。

由上所列,张燧完全抄录杨慎的26个条目中有6个的标题名亦是完全一致,其余绝大部分仅是对杨慎所列标题进行简单改造,如把“纳于大麓”改为“纳于大麓非山麓”,“孟明”改为“秦霸不由孟明”,“悬榻”改为“陈蕃悬榻”,“纵囚论”改为“太宗纵囚有所防”等。有些标题虽然与杨慎所名相差较远,但考其内容不过是对杨慎观点的概括,如“帝在房州之谬”条,杨慎名为“天王居于狄泉”,从标题上看,二者是相差较远,但内容却是一字不差,而且杨慎亦言“《纲目》书帝在房州,房州唐一统之地,岂得以乾侯为比,当书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”,可见张燧“帝在房州之谬”不过是对杨慎之语的简单提炼。另外,尽管上述条目是张燧完全抄录杨慎之言,但其中亦有许多迷惑性的语言使读者认为乃是张燧之论。如“陈蕃悬榻”条仅把杨慎“悬榻”条中的“愚谓”改为“杨升庵曰”,这样做似乎是说明“杨升庵曰”以后部分是杨慎之语,而“杨升庵曰”以前乃张燧之论,其实不然。“取刘璋不系孔明”条句末有“今以取刘璋为孔明病,盖亦未之考也”;“《出师表》缺句”条开篇有“孔明《出师表》今世所传皆本《三国志》,按……”;“徐有功难于皋陶”条文中有“愚尝谓为大将者……谁谓后世不及古人乎”;“宋人损益经文”文末有“吾未敢以为然也”。诸多“今”、“按”、“愚尝谓”、“吾”等,这些正在进行时语词和第一人称按语的迷惑性,使研习者会误为此乃张燧之论。

二、部分截割而未加标注

张燧《千百年眼》中既有上述完全摘录杨慎的,亦有对杨慎之文予以部分截取而未加任何自己内容的。具体表现如下所列:

1、卷1“古史之谬”(1页),见《升庵集》卷47“古史考”(368页),删去句末“予观近日刻《国朝登科录》,洪武庚戌至甲子不知取士之科几,开张显花伦金璫,不知为何科大魁,况考论洪荒之世

乎？”

2、卷1“巢、许非旷士”（3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49“王维谈名理”（406页），仅删去句末“维之谈名理如此，岂减晋人耶”。

3、卷2“二《雅》当以体别”（19页），绝大部分摘录《升庵集》卷42“大雅小雅”（303页），仅少句末“特为表出之”。另杨慎此条中“《大雅》所言皆受命配天继代守成与所以圣之事固为大矣；《小雅》所言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，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！”是源自宋代范处义《诗补传》卷十六“正《小雅》”条，但杨慎亦未注明。

4、卷2“左氏贬荀息”（23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43“荀息”（312页），仅删开头“涑水曰”三字。

5、卷2“秦缪公学于宁人”（24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42“寺人之令”前半部分（299页），颇有断章取义之嫌。

6、卷2“季文子三思”（31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45“季文子三思”（336页），因删去“左氏侈然称之。黄东发曰：行父”和文末“然则以三思称季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”，顿失杨慎之原意。

7、卷2“阳虎之奸”（32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43“盗窃宝玉大弓（八年）得宝玉大弓（九年）”（309页），仅删开篇“升庵曰”。

8、卷3“《孟子》句读”（42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72“书句”，是截取后半部分（709页）。杨慎之意在于讨论“古书句读多不同”，而张燧仅取其对《孟子》的举例。

9、卷4“古文多譬况”（53-54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52“古人多譬况”（仅取头尾而舍中间，未改一字）（444-445页）。

10、卷4“章邯未可轻”（61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49“章邯未可轻”（404页），仅少“方万里云”四字。

11、卷4“四皓赐碑”（70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48“四皓庙碑”（388-389页）仅删杨慎句末“故特表出之”。

12、卷6“李密《陈情表》讹字”（108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47“李密《陈情表》”（377页），仅删句尾“近日赵弘道作令伯祠记辨伪朝字，惜未见此”。

13、卷7“王导遗诛”（113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49“黄东发评王导”（412-413页）。此条是对杨慎之论的任意割裂，仅取开头，然后有从中间截取，而删掉一些重要的内容，如“近日阳明王公、后渠崔公皆有此论，与愚见不谋而合，因观黄东发之言，昔人已有此评矣，不厌重著之”（413页）。

14、卷7“王逸少经济”（113页），大部分截取杨慎《升庵集》卷49“王逸少经济”（405-406页）。

15、卷7“刘知几无史才”（120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47“老泉评《史通》”（370页），仅删开篇“老泉评刘子玄《史通》云世称其详且博，然多俚辞俳状，史之纪事将复甚乎，其所讥诮者唯子鍊为差愈。吁！其难而然哉！”和中间“二公之论当矣”，及结尾部分“黄山谷尝云论文则《文心雕龙》，评史则《史通》，二书不可不观，实有益于后学焉（刘子玄子鍊作《史例》三卷）。”

16、卷8“唐诗之盛不关选举”（131页），截取自杨慎《升庵集》卷54“胡唐论诗”（472-473页）

17、卷9“王朴异才”（148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49“王朴”（406页）删掉杨慎对王朴的概括之语“外事征伐，内修文治”、“近于知道矣”。

18、卷9“《纲目》正秦统”（161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48“秦一统十五年”（392页），删掉句末“信矣，刘氏《书法》、尹氏《发明》不能一言赞之何哉？”

19、卷10“宋儒谈天”（166页），截取杨慎《升庵集》卷74“宋儒论天”（729-730页）张燧删改“盖处于物之外，方见物之真也，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，何以知天地之真面目与，且圣贤之学切问近思，亦何必求知天外之事耶”（730页）为“盖处于物之外，方能见物。吾人不出天地之外，何以知天地之真也？”

20、卷11“夹杂道学”（188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75“夹杂道学”（750页），仅删句末“无乃谬耶”。

21、卷11“陈同甫格言”（190页），截取《升庵集》卷75“陈同甫与朱子书”（750-751页）删去“予喜其言有切于士病，故书之以自警。刘安世尝云愿士夫有此名节，不愿士夫立此门户，此元祐之士病。黄履翁云愿士夫务道学之实，不愿士夫立道学之名，则淳熙以后士病也。党籍伪学之禁，虽小人无忌惮，亦君子有以招之与”（751页）。

22、卷11“传注相沿之误”（190-191页），“注疏家所称‘先郑’者”至“尽扫宋人而归之朱子”是截取杨慎《升庵集》卷71“先郑后郑”（700页），此例可谓是割裂原文为其证据。且其文“今之学者吾惑之，摭拾宋人之绪言，不究古昔之妙论，尽扫百家而归之宋人，又尽扫宋人而归之朱子”颇具迷惑性，以为是张燧之言，其实是照录杨慎原文

上述22例中，张燧对杨慎之文的简单截取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，其一，删起始之句。这样的删减容易造成杨慎之言或杨慎引用他人之言，会被误认为是张燧所论。如第4、7条；其二，删结论之语。这样截取容易使杨慎表达观点之处，被张燧给抹杀掉，如第1、2、3、11、20条等。其三，是任意截取。这样造成的不妥：一是，造成一些重要内容被砍掉，如第13条，“王导遗诛”（113页）此条是对《升庵集》

卷49“黄东发评王导”的任意割裂，仅取开头，然后又从中间截取，而删掉文末“近日阳明王公、后渠崔公皆有此论，与愚见不谋而合，因观黄东发之言，昔人已有此评矣，不厌重著之”。第21条，“陈同甫格言”（190页）删去杨慎所言“予喜其言有切于士病，故书之以自警。刘安世尝云愿士夫有此名节，不愿士夫立此门户，此元祐之士病。黄履翁云愿士夫务道学之实，不愿士夫立道学之名，则淳熙以后士病也。党籍伪学之禁，虽小人无忌惮，亦君子有以招之也”。而其标题实取自杨慎“予喜其言有切于士病，故书之以自警”。二是，多有断章取义之嫌。如，第5条，“秦缪公学于宁人”（24页），是截取杨慎《升庵集》卷42“寺人之令”前半部分，颇有断章取义之嫌。第15条、“刘知几无史才”（120页）截取杨慎《升庵集》卷47“老泉评《史通》”，删去开篇“老泉评刘子玄《史通》云世称其详且博，然多俚辞俳状，史之纪事将复甚乎，其所讥诮者唯子鍊为差愈。吁！其难而然哉！”和中间“二公之论当矣”，及结尾部分“黄山谷尝云论文则《文心雕龙》，评史则《史通》，二书不可不观，实有益于后学焉（刘子玄子鍊作《史例》三卷）。”这样张燧以“刘知几无史才”颇有断章取义之嫌。

三、简单增删与割裂拼凑

在《千百年眼》中，张燧对杨慎之论采摘颇多，如果说完全摘录和部分截取尚能保留杨慎成果的部分原貌，那么其对杨慎之文的增删和割裂拼凑，则会造成原意大失。

1、卷1“帝赉良弼”（6页），是对《升庵集》卷42“高宗梦良弼”（294-295页）的删改，将“武丁以梦相传说事著于书矣，而世犹疑之曰：梦而得贤可也，或否焉，亦将立相之与，且旁求以象之肖也”改为“传说事，世咸疑之，以为梦而可得也，或否焉，亦将立相之与？”另外删去中间杨慎引用刘禹锡、元凯等人的精彩对白，替之为“此说辨矣，而亦非”，进而删去文末杨慎的进一步论说之文：“司马彪《庄子音义》谓传说生无父母，洪氏注《楚辞》谓说一旦忽然从天而下便为成人，无少长之渐，此儿童之言也，固不必辩”（第295页）。可谓经过张燧的修改、剪切，使杨慎之意大失。

2、卷1“太王未尝翦商”（9页），摘录《升庵集》卷42“大王翦商”（306-307页），删去开篇杨慎所引胡庭芳之论，换为“太王翦商之说，不知何据。夫太王迁岐，在商帝乙之世。商家中兴又五十九年”。另外删去表明杨慎观点的“余谓此言是矣，但未知诗之字误也”（306页），即杨慎是赞成胡庭芳之观点，而张燧则换为自己的感叹“呜呼！是何重诬古人也”，

接之便是大段截取杨慎之论。

3、卷1“世官之弊”（12-13页），摘录《升庵集》卷45“立贤无方”（346-347页）。删去杨慎开篇“孟子言汤执中，立贤无方者亦何取其义，至于穷旦夜之思而汲汲若是乎！盖尝考之”，另把文末“岂非万世君人相国之第一义乎”换为“固虞夏以来所未有也”。

4、卷3“鲁郊禘不出成王之赐”（36-37页），参依《升庵集》卷5“鲁之郊禘辩”（63-65页），绝大部分内容是杨慎的原话。张燧文末“记礼者以为鲁礼皆成王赐之，以享周公，而疑似于今，不可以不解。”似乎是其发现此说，而杨慎文末有云“经传之明证大案其众如此，曲儒之单闻孤说，其寡如彼，辩是非于千载之下，当何从，亦从其众而已”。另外张燧的标题是取杨慎之论辩结果。

5、卷3“西施不随范蠡”（45页），大部分内容是源于《升庵集》卷68“范蠡西施”（668-669页）。对于此问题，宋姚宽《西溪丛语》卷上，有对西施去向的怀疑，而张燧所引“唐《景龙文馆记》……畏入荷花”，与姚宽同，但张燧在文后有“余按……要之沉江之说为信。”似乎是其所论，颇有不当。张燧“西施不随范蠡”第一部分是对上述杨慎之论的摘录，而且是颠倒语序，杨慎是主张沉江说。第二部分当是摘录宋姚宽《西溪丛语》卷上，但姚宽的观点是“此诗云复还会稽，又与前不同，当更详考”。说明张燧是综合杨、姚的论说，而取杨慎之观点。

6、卷4“高祖酬赏遗轅生”（64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47“袁生”（381-382页）。仅开头加“汉高祖大封功臣，所遗不独纪信也”，另外对于杨慎引陆机之语，张燧加有“余考”二字，一看似乎是张燧所论，其实不然。再者，张燧对杨慎的论断也只截取一部分。

7、卷5“田千秋之贤”（79-80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49“田千秋”（404页），仅加“虽然……以所遇之幸耳。”

8、卷6“曹操讽汉复九州”（102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72“唐庚语”（709页），仅删“唐庚曰”，加“况鬼蜮如操耶”。

9、卷7“《兰亭》未可议”（113-114页），部分截取《升庵集》卷53“兰亭记”（466页）。对于《兰亭》不入《文选》，宋代多有所论，宋代史绳祖《学斋佔毕》卷二“辩《兰亭》不入《文选》之失”、王楙《野客丛书》卷一“《兰亭》不入《选》”。但张燧前半部分是摘录王楙之文，后半部分是源于杨慎之文，可谓是一文两取。

10、卷7“徐敬业之败”（125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70“败棋有胜著”（689页），仅是颠倒语序。

杨慎“败棋有胜著”条目原文：

尹德毅之说萧警龙敏之献策潞王从珂，魏思温之谋策李敬业，皆奇谋也。谚云：败棋有胜著。惜乎！当局者迷耳。

而张燧“徐敬业之败”条原文为：

敬业举义，魏思温劝其直趋河洛，以匡复为事。此与尹德毅之说萧警龙敏之献策潞王从珂，皆奇谋也。谚曰：“败棋有胜着”。惜乎当局者迷耳。

11、卷8“诗词讹字”（135-136页），是割裂拼凑《升庵集》卷60“书贵旧本”（576-577页）。

12、卷8“唐、宋逸诗赋”（136-137页），开篇至“今此二赋俱不传”完全摘自《升庵集》卷53“白牛溪赋”（463-464页），而“韩文公……而此赋亦不传”则是完全摘自《升庵集》卷52“二卢”（452页）。

13、卷8“李泌相业”（137-138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47“李泌家传”（381页），仅删去文末“眉山史照之言曰：家传诚不可尽信，亦岂得尽不信哉”，但文中补充部分“《家传》……握笔著《家传》十篇”是摘自《新唐书》卷139《李泌传》。

14、卷9“新、旧《唐书》优劣”（158页），简单增减《升庵集》卷47“二《唐书》”（370-371页），文中删去“余又观”，改为“如”，删改“宋人徒欲誇当代以诬后世，不知可尽诬乎！今具载二书之文于左”，改为“宋人徒欲以夸当代，不知后世耳目其可尽诬乎”。而杨慎所举的例子也被张燧删掉。

15、卷9“《通鉴》省文之谬”（162页），开篇至“殊可笑也”见《升庵集》卷47“牛继马”（381页），省去“又按唐元行冲元魏之后著《魏典》三十卷，引魏明帝时西柳谷瑞石有牛继马之像，旧时谓元帝本出牛氏，诬辞也。魏道武帝名犍，继晋受命，此其应也”。而张燧此论后半段则取自陶宗仪《辍耕录》卷24“汉魏正闰”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166《还山遗稿》提要中亦指出陶宗仪此论。

16、卷10“章惇有功长沙”（172页），是简单删改《升庵集》卷76“开梅山”最后一部分（756-757页），这样可能有断章取义之嫌。杨慎之论是对章惇开梅山之事，通过分析两首不同风格的诗，最终得出结论，而张燧则直接截取杨慎的结论

17、卷10“李泰伯非不喜《孟子》”（172-173页），开篇至“则尊之亦至矣”完全节选自《升庵集》卷48“李泰伯不喜《孟子》”（394页）对于此条张燧曰“按此语出杨升庵，可谓确见”，并且认为“胡元瑞极辨……则其无根亦甚矣”，其所论无根之谈与杨慎最后的论断，“今之浅学舍经、史、子、集，而勦小说以为无根之游谈，故详辩之”相同，但张燧

却将此句删掉。

18、卷10“宋礼儒臣”（173-174页），是简单删改《升庵集》卷48“宋主礼儒臣”（394页），仅把“宋之君崇礼儒臣过于汉唐，正史之所遗者有二事”删改为“宋之君崇礼儒臣”，而把“后之则如弱主之畏豪奴，岂曰荣遇美事乎，书之祇辱”改为“后之则如弱主之畏豪奴，书之只辱青史，岂曰荣遇美事乎？”

19、卷11“张千载高谊”（197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48“张千载”（402页），删去“刘须溪纪其事赞于文山像后曰：间居忽忽万古咄咄，天气惨然如动生发，如何寻约亦念续芻，岂其英爽犹累形躯，同时之人能不赧泚，昔忌其生今妬其死”，而在句末加“而千载高谊，亦千载而下所不多见也”。

20、卷11“刘辰翁节行”（197页），是截取《升庵集》卷49“刘须溪”的开头部分（411页）。

21、卷12“御制《尚书》二解”（201页），见《升庵集》卷42“圣制《尚书》二解”（289页），仅在文末加“黄黄圣训，不独高光却步，即唐文皇视此，退舍远矣。”

以上21条，是经过张燧的加工处理，其表现手法：

一是简单增删，变换语句而观点不变。如，第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13、15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条。尽管《千百年眼》属于读书札记之类，但张燧如此处理资料颇为不妥，使后人难以把握其资料之来源。譬如，第6条，“高祖酬赏遗轘生”条，是简单增删《升庵集》卷47“袁生”条（381-382页），其文为：

陆机《汉高祖功臣颂》曰：“袁生秀朗，沈心善照。汉旆南振，楚威自挠。大略渊回，元功响效。邈哉斯人，何识之妙。”按《汉书》轘生说汉王曰：“愿君出武关，项王必引兵南走。王深壁，令蒙阳、成臯且得休，乃复走蒙阳。如此则楚所备者多，力分，汉得休，复与之战，破楚必矣。”其后高祖未酌其赏，故史不列于功臣之数。陆机作颂，乃侔之二十一人之列，可谓发潜阐幽矣。王应麟曰：“轘生说行而身隐，鸿飞鱼潜，脱屣圭组，远希鲁连，近慕董公，亦古之逸民，不可与辩士说客并论也。”慎按《姓氏书》轘生乃轘塗之后。汉有轘固生之后也，其后去车为袁。《后汉袁良碑》叙其世系曰：当秦之乱，隐居河洛，高祖破项，实从其策，天下既定，还宅扶乐。文失其名，碑亦阙焉，非陆士衡、王伯厚发其潜德，人亦罕知之，予故汇之以补班史之遗焉。

而张燧仅在杨慎“袁生”条开头加“汉高祖大

封功臣，所遗不独纪信也。”另外对于杨慎引陆机之语，张燧在其前加有“余考”二字，一看似乎是张燧之考论，其实不然。再者，张燧对杨慎的叙述也只截取其前半部分，删去杨慎的论断之语。杨慎之意在于搜集资料补充《汉书》之所缺，经张燧的删改，既不能体现其所谓“高祖酬赏遗轸生”之意，亦失去杨慎“袁生”条之本意。

二是割裂剪裁、颠倒语序之拼凑。如，第5、7、9、10、13、14、17条。杨慎之文经过张燧剪辑拼凑，不仅使后人难以判断何为其论，更使原创者之本意被抹杀殆尽。譬如第3条，杨慎《升庵集》卷68“范蠡西施”（668-669页）原文是：

世传西施随范蠡去，不见所出。只因杜牧“西子下姑苏，一舸逐鸱夷”之句而附会也。予窃疑之，未有可证以折其是非。一日读《墨子》曰：“吴起之裂，其功也；西施之沉，其美也”。喜曰：此吴亡之后，西施亦死于水，不从范蠡去之一证。《墨子》去吴越之世甚近，所书得其真，然犹恐牧之别有见。后检《修文御览》见引《吴越春秋·逸篇》云：“吴亡后，越浮西施于江，令随鸱夷以终。”乃笑曰：此事正与《墨子》合。杜牧未精审，一时趁笔之过也。盖吴既灭，即沉西施于江。浮沉也，反言耳。随鸱夷者，子胥之潜死，西施有力焉。胥死，盛以鸱夷，今沉西施所以报子胥之忠，故云随鸱夷以终。范蠡去越，亦号鸱夷子，杜牧遂以子胥鸱夷为范蠡之鸱夷，乃影撰此事以堕后人于疑网也。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诬千载，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！

张燧“西施不随范蠡”之文是：

自杜牧有“西子下姑苏，一舸逐鸱夷”之句，世传范蠡载西施以逃。及观《修文御览》引《吴越春秋·逸篇》云：吴亡后，越浮西施于江，令随鸱夷以终浮沈也。子胥之被谗，西施有力焉。子胥死，盛以鸱夷，浮之江，今沈西施于江，所以谢子胥也。范蠡去越，亦号鸱夷子，杜牧遂误以子胥为蠡耳。《墨子》曰：“吴起之裂，其功也；西施之沉，其美也。”

岂非明证哉！文士一时趁笔，遂堕后人于疑网。

两文相比对，可见张燧所引资料和杨慎之文完全相同，只不过是对于杨慎“范蠡西施”条进行简单删改，语序稍有调整而已。

上述第11条，“诗词讹字”条（135-136页）是割裂拼凑《升庵集》卷60“书贵旧本”，张燧删去开篇“观乐生爱收古书，尝言古书有一种古香可爱，余谓此言末矣”，以及“余于滇南见故家收唐詩紀事抄本甚多，近见杭州刻本则十分去其九矣……”，张

燧结尾为“凡此皆系改本谬伪百出，书所以贵旧本也。”是改写杨慎之结尾“其余不可胜数也，书所以贵旧本者，可以订讹，不独古香可爱而已。”经过张燧的删改完全没有杨慎“书贵旧本”之意，但张燧仍袭杨慎之文，却换其标题。另外张燧此文对杨慎所举之例，任意颠倒顺序。另“古诗……拟字胜亦字”完全摘自《升庵集》卷58“贱妾亦何为”；“《南史》王晞诗……正用晞语也”，完全摘自《升庵集》卷56“日暮”；“《儋耳山》……遂使全篇俱病”完全摘自宋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卷1。“诗词讹字”可谓是一文多取、拼凑之作的典例。

四、取其文而乱其意

张燧在对杨慎之文进行摘录、截取时，常根据个人之理解而添设标题，这样不仅导致原意丧失，而且多有断章取义之弊。其例如下：

1、卷11“采石之战有先备”（183页），开篇至“可谓不易之论”是简单截取《升庵集》卷51“虞雍公功烈（允文）”（439-440页）。诸如删去“余窃妄论宋朝多议论少成功，虽盛时犹然也。况积习消磨之余，夫人皆喜逸而恶劳，图安而惧危。中兴以来，前有张魏公，后有虞雍公为国家任其劳。当其危者也，彼不少愧焉，而又忍短毁之乎”（440页），可谓抹掉杨慎评点的精彩之处，而且张燧之标题仍是文不对题。对于虞允文此事，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卷247“经籍考七十四·虞雍公奏议”有所阐述，但杨慎文中丘濬之论当是其补，所以张燧当是参依杨慎之说。另外，此条后半部分当是节选《升庵集》卷47“海鳎船”，杨慎注此条源于《杨诚斋海鳎船赋序》，张燧仅在文末加“此亦致胜之由也”。

2、卷11“守唐、邓可以图恢复”（184页），是简单删改杨慎《升庵集》卷47“虞雍国忠肃公守唐、邓欲取长安事”（383-384页）。杨慎本意是保存史料，而张燧删去了杨慎所举眉山任燮的论断，另外又删去文末“允文城唐、邓欲取长安事，不见于史而见于任燮之文，健武遗民之忠勇亦不见于史而见于范成大之《北辕录》，予特表之”（384页），导致文意大失。另外，张燧的标题只是对杨慎之论的笼统概括，杨慎之意有二：其一，说明如果依虞允文之策可以收复长安；其二，杨慎还有保存史料之意。但经过张燧的删改，仅勉强体现其一。

通过上述例子，可见张燧对杨慎的著述是非常熟识的，可以说达到信手拈来的程度，但遗憾的是通过其“千百年眼”的识断，却使杨慎原文的精彩之笔顿失，而且与原意亦相差甚远。

五、张燧因袭杨慎之文的原因

张燧《千百年眼》中近乎六分之一的内容是源

于杨慎之书，且分布于《千百年眼》的各卷中，对于这位喜读书史，且“不苟同”之士^①，这难道是一种偶合？笔者认为，通观《千百年眼》全书的体例，是按时间顺序，从先秦至明代，纵贯而成，显然是一种通史的写法。说明张燧在材料安排取舍上用功颇深，那么为何出现大量因袭杨慎之文的现象呢？笔者认为除去学界所批评明人学术空疏，草率为文之外，还应有以下原因：

其一，受李贽的影响

李贽在《焚书》中专门列有“《杨升庵集》”条目，是李贽读《升庵集》的体会，如其所言“予读先生文集有感焉”^②。且《焚书》中亦列出二十余篇李贽读《升庵集》的感言，如《伯夷传》、《岳王并施全》、《张千载》等条目皆是对《升庵集》内容的评断。因此，有学者认为李贽的异端思想一定程度上受杨慎影响^③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而同样以异端自我标榜的张燧，当是因李贽之学而研习杨慎之书。因为李贽摘录杨慎之文，而张燧亦对李贽所录之文进行转抄。如张燧《千百年眼》卷2“季文子三思”条，其内容为：

季文子相三君，其卒也，无衣帛之妾、食粟之马，无藏金玉、无重器，可谓善矣。然怨归父之谋去三家，至扫四大夫之兵以攻齐，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，行父不能讨，反为之再如齐纳贿焉。……诚如其言，则《中庸》所谓“思之弗得弗措也”，《管子》所谓“思之思之，又重思之，思之不通，鬼神将通之”，吴臣劝诸葛恪“十思”者，皆非矣。

按：李贽《焚书》卷5“季文子三思”条，应是抄录杨慎《升庵集》卷45“季文子三思”条：

文子相三君，其卒也无衣帛之妾，食粟之马，无重器备，左氏侈然称之。黄东发曰：“行父怨归父谋去三家，至扫四大夫之兵以攻齐。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，行父之不能讨，反为之再如齐纳赂焉。……诚如其言，则《中庸》所谓‘思之不得弗措也’，管子所谓‘思之思之又重思之，思之不通，鬼神将通之’，吴臣劝诸葛恪十思者，皆非矣。”

但李贽此文当是抄录《升庵集》卷45五“季文子三思”，李贽只是删去杨慎“季文子三思”文末“然则以三思称季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”。而张燧则是

对李贽之文的截取，仅删去“左氏侈然称之。黄东发曰：行父”。

上述之例可以说明张燧是在李贽的影响下，对杨慎之著述予以关注，譬如张燧《千百年眼》中在抄录杨慎之文时，亦多有引用李贽之论予以佐证。遗憾之处是，李贽在评析《升庵集》时，对于杨慎之论都是有所注明的，而张燧颇有掠人之美之嫌疑。

其二，对杨慎学问的推崇

张燧在《千百年眼·自序》中对人的见识分为“豪杰之眼”、“文人之眼”、“俗儒之眼”，他是反对论述“迂疏无当”的文人之眼，更批驳“影响剿袭，满纸炫然”的俗儒之眼，而极力赞成“无所规摹，亦无不破的”豪杰之眼，可见，张燧是很看重具有创新意识的学问。而杨慎作为嘉靖朝的状元，在作人和学问方面，都是超乎常人的。这无形中增加了张燧对杨慎的崇敬，如《千百年眼》卷9“晋、唐不通字学”，张燧在引用杨慎《六书索隐序》后，称其“引驳甚精，足为字学开一堂奥。”另卷10“李泰伯非不喜《孟子》”条，张燧认为杨慎之论“可谓确见”，而称胡应麟之辨“则其无根亦甚矣”。在卷12“杨介甫父子相业文章”条，张燧对杨慎的评论为：

余盖尝评论之：升庵博洽似张茂先，诗文似庐陵、眉山两先生，坎壈过汉之贾长沙，而经术解悟直越宋之程、朱而上之。有升庵而当代之人物可与往哲争衡矣！矮人观场，徒谓先生为博学人，而一二崛强之老，又且掇拾其后，是皆不知先生，又何足以为先生重轻耶？^④

正是缘于李贽《读升庵集》的影响，以及张燧对杨慎阅历和学问的崇拜，再者，当时“《升庵文集》盛行于世”^⑤，为张燧能见到《升庵集》提供了便利条件，“（张）燧著书颇学杨升庵，特学力未及，然亦时有新解”^⑥，这样才出现《千百年眼》中大量摘引杨慎之文的现象。

（责任编辑：刘兵）

①参见武新立编著：《明清稀见史籍叙录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147页。

②李贽：《焚书》卷五，《杨升庵集》，岳麓书社，1998年，第205页。

③田同旭：《论杨慎对李贽异端思想的影响》，《晋阳学刊》2007年第1期。

④是论前半部分出自张燧对杨慎的赞誉，而后半部分则是源自李贽《读升庵集》中对杨慎的评论，其文为：“况复有矮子者从风吠声，以先生但可谓之博学人焉，尤可笑矣！”《焚书》，岳麓书社，1998年，第205页。

⑤李贽：《焚书》卷五，《唐贵梅传》，岳麓书社，1998年，第208页。

⑥王重民：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336-337页。